

读者参考

丛书
64

谁夺走了我们的富裕感

◎龙永图：中国不能赢家通吃

◎反思五年房改 ◎中国股市，困囿于信用空洞化

◎为什么茅盾文学奖越来越没声息

◎超越“狼图腾”的心理结构 ◎亚洲人为何不快乐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丛书

(64)

谁夺走了我们
的富裕感

目录

中国农村面临决定性巨变	1
中国经济需要减速	7
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10
龙永图:中国不能赢家通吃	13
中国需要低调一百年	16
安理会改革冷眼看	19
2005,金融改革迎来黄金时间	23
亚太之链	30
反思五年房改	34
谁夺走了我们的富裕感	
——解读长三角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困惑	38
“穷人经济学”振聋发聩	33
中国股市,困囿于信用空洞化	40
股市是社会正义的测验场	47
上市公司高管凭什么接连加薪	29
不要到危险来时才磨牙	
——世界 500 强企业 with 大学生、求职者	
的对话	49
不能及时成功就是失败	54
盖茨给毕业生的人生箴言	60
三口之家	56
女人,你们为什么不优雅	58
中国式婚姻未来十大变化	61

陈丹青追忆陈逸飞:

“没有人能够替代他”	62
约翰·保罗二世他是谁	65
高贵的傅聪	69
林肯的家教	76

不可不知的人生定律	79
世界上最经典的几句话	68
心灵的韧度	37
做聪明人易,做善良人难	55

警惕网络骗子	80
中国 NEET:逃避长大的一代	86
物质刺激与道德觉醒	48
“宜居”:城市发展的关键词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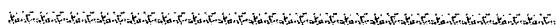
“百富校友榜”背后的浮躁	92
讲师之死与大学之痛	94
语文教科书之变	88

“成长压缩”:尴尬的儿童版青春

课题	99
以哈佛论成败是素质教育的噩梦	104
美国教子的七大忌讳	110

职业体育竞争中国热度	105
大脚解围(外一篇)	111
用球杆挣回人生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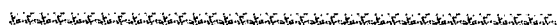
戛纳精神与法国电影	118
“黑马”陆川	122
美国电影电视审查制度揭秘	116
传统戏剧路在何方	127
吴敬琏:莫扎特伴我一生	129
交响曲与神秘的“九”	131
贾平凹:悲凉慢板唱《秦腔》	132
为什么茅盾文学奖越来越没声息	138
新世纪,文学有些什么变化	142
丹·布朗何以风靡全球	139
安徒生能否感动今天的童年	102
名著浓缩一句话	144
关于《圣经》	151
失衡的出版业	153
《读书》论争的另一种解读	154
小心 100 个文字“陷阱”	97
权谋文化与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 ...	156
坚定的信念 无畏的探索	93
经济偷窥学	158
深度城市化问题	160
海啸 & 奥斯威辛(外一篇)	169
超越《狼图腾》的心理结构	165
“轻伤就应下火线”	179



“末位”淘汰不如“首位”竞争	238
“原罪”与酸葡萄心态	167
扣诊中国法律核心价值	170
人代会的成本与效能	173
“中国式赔偿”困境待破	178
公民将有权修正自己档案	180
立法是为了方便政府还是方便社会	182
危害人类文明及生存的十四大因素	184
湿地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188
世界的真正主人——微生物	190
互联网正加紧颠覆电视	192
政府门户网站排名解读	199
尖端武器五大亮点	203
美军自毁航母给人的启示	181
钱钟书谈上海人	135
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的诞生	208
茶馆：杭州的别样文化	215
少林寺的现代化生存	217
连宋大陆行，台湾民意如何	174
国民党影响台湾六十年	222
香港经济将继续向好	225



孔子在欧洲	228
洋老板在中国	232
吃和盗版,外国人眼里最可爱	236
透视中日美“三角贸易”	210
国外百姓怎样买房	239
亚洲人为何不快乐	198
英国“下乡”成时尚	242
印度的医保体制	244
越南:最后的“亚洲虎”?	246
谁是“全球最安全城市”	183
蒙古男少女多麻烦大	143
经济学者应该超越“阶层利益”	235
公务卡直指腐败消费	18
工业大国已是我国基本国情	166
养老金实名制将逐步推向全国	164
景区门票蛮涨的双重不道德	78
腐败:变“不敢”为“不能”	22
我国正式实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150
中国已成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128
“洋快餐”的五宗罪	249
留意心脏的“求救信号”	53
老人跑步要收腹	46
如何睡午觉最有效	231
“有车族”当心未老先衰	112
早餐最好在 7 点以后	241



多睡不如巧睡	202
老人仰卧睡眠好	75
果汁越放越没营养	121
运动心跳次数预测猝死	189
不同营养与肿瘤的关系	191
粗茶营养更高	6

鹰的启示	216
你会喝咖啡吗?	224
鲜为人知的民族	64
女人和男人的日记	207

今日说法 57、85、126、130、152、172、187

语丝 39

封面图片 《上升的红日》

摄影:杰姆·布兰登伯格 选自林路著

《摄影艺术二十讲》,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MULU

SHUI

DUOZOU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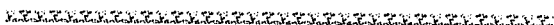
WOMENDE

FUYUGAN

DUZHE

CANKAO

CONGSHU(64)



中国农村面临决定性巨变

□方 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来安县 60 多岁的农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增收了近千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宣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初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中国“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带给中国农民的最大福音。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咏着“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的农诗，唱着“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只留一斗完婚嫁，愁的人来好白头”的民歌，忧愁而无奈地抒发着内心的苦恼：农耕苦、苛税重。

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农业的耕作方式、土地制度乃至国家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中，但中国农民却始终处于税赋制度的最底层。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各级官吏则要“催租求考课”，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直到中国政府终结“皇粮国税”的宣言发表，中国人才第一次相信，

“种地”与“交租”并非天生一对，苛捐杂税理应远离农民。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事关农村经济利益大调整的重大决策，目的在于真正实现“耕者有其利”。

中国政府的农村税费改革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也被称为 1949 年以来继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内的改革，而是一场关系到农村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如何去适应经济基础的一个大改革，它必将全面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步伐，以帮助占世界人口 15% 的 9 亿农业人口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共享发展成果，既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深刻的改革也将这样的课题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农业税减免之后，财政缺口如何填补？乡镇机构如何改革？基层干部如何服务农民？还有哪些相应改革要跟

上?随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了第一步,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

免税:贯彻“新重农观”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严苛的税赋制度的最底层。就在前几年,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也许有人并不知晓,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税率达到8.4%。

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为“公粮”,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也许负担不算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在背负着众多税赋与收费的广大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

资料显示,一些地方机构人员臃肿,平均每30位中国农民养活1名乡镇干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每年征收约600亿元人民币的农业税。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幅连续5年递减。

“为农民减负,帮农民增收”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一征收40多年的税种被取消。

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减税,并非执行国家的“规定动作”,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推出的“自选动作”。人们看到,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事实上恰是越贫困的地区,才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但只有这一次才真正距离理想这么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说。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郑重承诺,5年内免除农业税。而今,这个时间表又提前了2年。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提前宣告终结,体现的正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新重农思想”。

理应反哺“母亲产业”

2004年,中国农业画出了一条漂亮的上行曲线。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的影响下,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4550亿公斤预期目标,5年粮食减产局面一举扭转。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预计超过5%,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的

一年。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全国农民一共减轻农业税负担280亿元,农民税费“减负”幅度普遍达30%以上。

数字和事实都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方面是农业、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高付出与低投入的强烈对比,其中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

当工业“长大成人”,我们不能再无休止地吮吸农业的“乳汁”。“理应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反哺我们的‘母亲产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张连珍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也应是社会文明进步成果享受者。

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3万亿元,中国尽早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去年一些减免农

业税的省市财政收入增长仍然超过20%,这为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支持。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曾业松研究员说:“提前两年实现农业税的免征,一方面表明了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正如新一届政府强调的那样,“三农”问题“仍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取消农业税入手”。

虽然,从国情出发,我们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农民大量的补贴,但这毕竟已经开始。

中国政府解决 “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去年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单”,但专家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帮忙”,在高粮价的比较效益下,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警号”。

“高价农资”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化肥价格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粮食增产带来的收益。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资价格出现历史罕见的淡季逆势上涨趋势,2005年农资市场调控难度加大。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冷静指出,当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存在四大

“软肋”：

一是耕地、淡水资源短缺，从1996年到2003年7年间，耕地减少了1亿亩；

二是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45%左右，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30%左右；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到4成，配套率不足7成，低中产田的比例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3；

四是承受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压力。

显然，解决上述问题，仅靠中央的“一号文件”等惠农政策已远远不够。从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中国政府正从多方面着力破解“三农”难题。权威人士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从“一点突击”到“多点推进”的变化，折射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

——告别“皇粮国税”，财政承担800亿元缺口。财政部负责人表示，到明年中国将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征收的税种，包括农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三个税种加起来税收约800亿元。

减少的税收收入，80%左右由中央财政承担，20%左右由有关的省、市、自治区按照一定的政策承担，主要是东部地区，全额保证将减少的这块收入转移支付给县、乡。

——150亿元改善县、乡财政困难局面。县、乡是中国行政运转

的最基层单位，因为历史、体制等复杂原因，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和粮食主产区的县、乡出现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财权上收，事权下划，造成了基层财政运转困难。

据透露，中央财政将拿出150亿元加大“输血”和“造血”，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帮助县、乡摆脱财政困难。

——再提2.4个百分点，国债支农资金比例不降反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姜伟新表示，今年国债投资安排尽管有所减少，但仍向“三农”倾斜。初步安排用于大农业（农、林、水、气）的投资比例，比2004年再提高2.4个百分点。一些有条件的项目，很可能在年度执行中再增加投资。

——293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

——14亿元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安排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资金4亿元，安排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补助资金10亿元……

中央党校曾业松研究员说，今后在“支农”、“补农”的政策上既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增强政策的“边际效应”，实现农民的增富减贫。

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必须抓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切实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粮，建立销售协会等中介

组织,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永远赶不上消费支出的增长?

专家指出,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确实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来。

记者在江苏镇江调查时,看到这样一份让人欣慰的农民增收“成绩单”:

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 5372 元,比上年增长 13.5%,并呈现出几大亮点:工资性收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长 15.5%;税费支出大幅下降,去年全市农民负担总额同比下降一半;粮食直补全部兑现,全市人均 19 元。

然而,细算农民的支出账时,就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分析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农民平均支出 3798 元,占收入 7 成以上。

这其中,食品、住房、医疗等生活性支出达到一半;农民的生产费用支出比上年增加了 40.4%,除种地投入增加外,部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教育支出占第三,占 15% 左右。

这表明,农民增收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被支出的增长抵消,真正的收入积累还不是很多。

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农民

供孩子上学相当“吃力”,农村学校因资源短缺也难以维持。

来自吉林省农调队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省 200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7%,而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则增长 25.8%。

如果说,教育成本过高,特别是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已经成为部分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是与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不相称的话,那么另一困扰广大农民的问题就是“看病难”,这几乎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阴影。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就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

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 100 多个村庄的调查表明,有 32% 的婴儿是在家里出生的,有 78.6% 的农村人口是在家里死亡的。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1998 年至 2002 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02% 下降为 0.69%。占全国近 70% 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 33%。

“没有 9 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

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一些专家指出,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就永远赶不上消费支出的增长。

人们看到,免征农业税后,中国政府仍然面临多重考验:如何防止农资涨价、教育医疗支出“掏走”免税实惠,不再扮演“收税者”的广大乡镇干部工作如何定位,乡村集体如何开展农村公益事业,乡村债务黑洞如何填平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能否持续提速。

有专家认为,在中国农村,冗官、冗员现象十分突出,这与基层政府有权收税、收费有直接关系。免去农业税,也就直接收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因取消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可以消化解

决,并能迫使基层政府削减冗余人员,这将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提出:“农业税取消实际上是一个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政府应当考虑的就是农村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并且注意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

曾业松研究员表示,取消农业税后需要做的是“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而且这是“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同时需要改革的还有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这些改革一旦同9亿农民联系起来,都将成为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硬骨头”。

(摘自《环球》)

粗茶营养更高

以绿茶为例,绿茶素以最嫩、最新鲜的茶叶为贵,但从营养角度来看,并非价格昂贵的新茶一定胜于价格低廉的粗茶和老茶。新茶多为嫩芽,叶片很薄,其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物质,几乎不含茶多酚、茶丹宁以及茶多糖之类苦味物质,所以喝起来口感醇香绵和。随着日照时间增加,茶叶叶片变得肥厚,茶叶中大量积累多酚类物质与丹宁,此时采摘的茶叶味道较苦,即我们常叫

的“粗茶”。

茶多酚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能抑制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的伤害,有抗衰老作用。它还能阻断香肠、火腿中亚硝胺等致癌物对身体的侵害。茶丹宁则能降低血脂,防止血管硬化,保持血管畅通,维护心脑血管的正常功能。茶多糖能缓解和减轻糖尿病症状,有降低血脂、血压等作用。所以,从健康角度看,粗茶的营养价值反而更高。

(摘自《环球时报·
生命周刊》芮莉莉文)

中国经济需要减速

□尹中立

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金融风险,而房地产行业投资的连续高速增长,带来了钢铁、电力和煤炭的短缺。可见,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房地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事关宏观调控工作的成败。当前的中国经济需要减速而不是加速,与 1998 年的环境正好相反。

一、高层认识为何统一?

最近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的变动,透露出的第一强烈的信号是决策层对房地产市场的认识得到了统一。

在此前,高层对房地产市场的认识并不统一。最早对房地产行业提出预警的是央行,2002 年 8 月,在重申了“低利率、鼓励个人住房信贷、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之后,央行首次提到要“防止产生房地产泡沫,防止信贷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但是央行的预警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2003 年之后央行对房地产市场政策的关注度不断增加,2003 年 6 月,央行终于下发了被业界称为“121 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商业银行不得给自有资金比例低于 30% 的房地产商贷款的规定,但是时隔不久,国务院又出台了 18

号文件,业界普遍认为这个文件是对央行 121 号文件的一个否定。2004 年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中,我们也能够明显注意到国家部门之间意见的不统一,最明确的标志是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观点上的不一致。

2005 年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问题列为价格工作的两个重点之一,5 月份,与房地产有关的七部委又联合出台文件,它充分地反映了中央各部门在对房地产泡沫问题的认识上得到了统一,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为什么高层对该问题的认识得到了统一?最高决策层对房地产市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8 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与消费,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是

通货紧缩的压力;但 2003 年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部分行业的过热现象,煤、电、油、运全线告急,进出口连续几年增长超过 30%,加剧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环境的摩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喋喋不休。尤其要注意的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就是房地产行业,没有房地产行业投资的连续高速增长,就不会有钢铁消费与生产的高速增长,也就不会有电力的紧张和煤炭的短缺,运输的压力就会缓解。可见,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房地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事关宏观调控工作的成败。当前的中国经济需要减速而不是加速,与 1998 年的环境正好相反。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金融风险。经过 4 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已经占银行总量的相当的比重,房地产金融的风险越积越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充分重视。以上海市为例,2004 年,在投资和各项贷款增速明显回落的背景下,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继续呈高位运行态势,推动上海房地产贷款继续强劲增长。上海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自营性房地产贷款累计增加 1023 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比例高达 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增加 728 亿元,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中长期贷款增量的比例高达 48%。

二、调控点 为何转向地产价格?

调控的重点由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转向房地产价格。2003 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中,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偏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控投资规模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是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但调控的结果并不理想,控制土地的结果是地价不断上涨,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的不断上涨必然使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增加,而暴利的存在就会冲破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约束。事实表明,2003 年之后,大量的资金通过非银行的渠道进入房地产行业,企图通过控制土地和信贷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很难取得成功。

三、要从政治的角度 分析“新政”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社会矛盾会激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保持 7% 以上的速度持续 30 年以上,当经济总量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持续增长超过 23 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或社会动荡。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深刻背景。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时刻不能忘记“构建和谐社会”的宗

旨,不能够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分析房地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问题政治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因为获得适当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的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干预市场,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例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政府应该确保所有阶层都能获得住房,并规定政府各部门有责任制定住房计划,以保证下层人民的住房权利。

我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以2003年为例,我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总投资为600亿元,只占当年房地产总投资的6%,2004年的

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占房地产总投资的比例不到5%。因此,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我们迫切的任务,政策上对低收入群体的倾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房地产新政中,这一点反映得十分充分。

四、要管住地方政府

新政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各个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会列入到地方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内。我认为此举对房地产行政控制最有效,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因为中国部分房地产价格不健康的上涨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价格上涨。

一些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主要有以下五招:第一是大量拆迁,刺激市场需求;第二是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推动房价不断上涨;第三是抬高土地拍卖的价格;第四是控制和取消经济适用房;第五是操纵媒体,有的甚至操纵房地产统计数据,误导消费者。

可见,让地方政府对当地房价负责是有根据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该政策的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要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摘自《南方周末》)

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许博渊

据说，中国人发明机关枪比德国的马克西姆早了 100 多年，发明者准备献给有关部门，被人劝阻，说别缺德了，造这种凶器干什么。几百年后，中国人吃力地追赶着西方科技发展的步伐，面对现实无法停步。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我们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力量对比将与鸦片战争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很难画出一道杠杠来，一般认为始自明朝中叶，因为元朝马可波罗来华的时候，还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得傻了眼。

明初，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装备还优于西方，但到 1492 年，即明弘治年间，哥伦布的船队已经到了美洲，我们却放弃了海外探索。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西方在天文、历算和火器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徐光启等官员要虚心地向他学习。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众说纷纭。

最接近事实的恐怕还是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

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视野，也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然而，为什么小农经济在中国延续时间如此之漫长？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求助于地理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了。

中西科技地位嬗变的 地理政治和文化政治原因

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希腊。希腊多山，缺乏可耕地，没有商业互通有无不能生存，又临着地中海，具备海上贸易的条件；于是，希腊商人遍布地中海沿岸。他们甚至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最远的到了黑海沿岸。

罗马帝国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全欧洲，野蛮民族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文化。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势力都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大。欧洲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他们在城市中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正如希腊商人带有海盗色彩一样，西方海洋国家在对外扩张中也